



# 新人湧現競爭激烈 優質民主落地生根



銳評

韓成科

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提名期結束。選委會1500席之中，有362席是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、港區全國政協委員、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當然委員，156席是機構提名產生的委員，在982席需要經選舉產生的委員中，今屆共收到111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及40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，報名人數較上屆大幅增加，選舉的競爭性亦顯著提升。在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完成參選人的資格核實之後，今屆選委會選舉也將正式開打。

## 激烈競爭程度遠超上屆

今屆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二次選委會選舉，經過上屆的探索和實踐，今屆選委會選舉不論在激烈程度、參選人的代表性、多元性，以至選舉的不確定性上都遠高於上一屆。參選人對於選舉部署更加精細，政綱更加扎實，光譜更加廣闊，選舉工程也更加成熟。選舉充分展現出「愛國者治港」下的良性競爭。盤點選委會五大界別的戰況，顯現出選舉的三大特點。

一是競爭更加激烈。大多數界別都出現「差額」競爭，不存在「躺贏」，要勝出只能憑表現、政綱、往績去爭取選民一票。在上屆選委會選舉中，扣除當然委員和經提名產生的委員，共有603名候選人自動當選，其他412名候選人競逐364個席位。選委會過去較多出現自動當選，這與工商專業等界別的選舉特性有關。但經過一屆的運作，選委選舉愈來愈受到各界重視，這個慣性明顯打破，選委會的競爭性也大幅提高。

第一界別工商及金融界，18個分組全部超額報名，全部都要競爭，競爭程度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。第二界別專業界，也只有極少數出現等額選舉，差額競爭已經成為常態，其中社會福利界及醫學及衛生服務界等組別，今屆戰況更加激烈。第三界別基層、勞工及宗教等界。基層社團組別選舉不但差額數大，而且參選者都具有豐富的基層社團經驗，各有不同的特點和側重。單看參選人的資歷，已經不可能存在「躺贏」。第四界別立法會議員、地區組織代表。鄉議局同樣出現競爭，至於港九「三會」、新界「三會」更是今屆選委會選舉的焦點戰場，競爭激烈，選舉不

確定性高。「三會」不但是香港基層治理重要一環，也是香港治理的「人才庫」，成員來自不同界別，這次兩個「三會」組別的選舉差額數都是各組前列，其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。

二是選舉既有新人湧現，也有資深業界人士參與競逐，人才更加多元。今屆選委會選舉的競爭性不單體現在差額選舉之上，更體現在參選人的質素，都是具有相當的資歷，長期服務所屬界別或社區，具備一定經驗及服務熱誠，今屆更展現兩個特點：

一是新人的大量湧現。在香港的專業界別中，過去新人不易爭取到參選機會，這與一些界別論資排輩的特性有一定關係，新人要出頭不易，但在新選舉制度下，有心有力有才的新人，同樣得到參選機會，在工商專業、基層同鄉社團以至「三會」等不同界別，今屆都有大批首次參選的新人競逐。新人的湧現將為選舉帶來更多新血和活力。

二是選舉不單新人湧現，也有不少舊人「崔護重來」，例如前法律界猛人「復出」參選、外資大班首度參選等等。新人舊人踴躍參選，展現出選舉更廣泛的代表

性、專業性，也為選民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，不必「含淚投票」只有「優中選優」，這也彰顯了選委會選舉得到愈來愈廣泛的支持和認同，含金量不斷提高，好的制度自然吸引更多好的人才參選。

三是參選人對政綱和選舉工程的高度重視，體現「愛國者治港」下的良性競爭。今屆選委會選舉的另一特點，是參選人對於選舉政綱以及選舉工程的重視。在報名期間，不少參選人已經提出了相對完整的選舉口號、政綱，精心設計的宣傳品陸續推出，各種拜訪、聯繫、拉票工作也在全面推進。以選舉工程而論，選委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相比，同樣細緻，同樣激烈，同樣周密，只有真打沒有「躺贏」，是真正的選戰。

## 新選制先進性不斷彰顯

過去有一種說法，認為選委會主要是選舉行政長官，參選人的能力表現並非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云云。這種說法並不準確，相反正是由於選委在香港政制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，對於選委的要求也自然更高，也自然令到選舉更加激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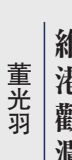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法例，選委會有三大主要職能：

一是負責提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，並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候任人。二是負責提名所有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。三是在立法會選舉中，負責選出其中的40名選委界別的立法會議員。角色重要，職責重大，選民更需要通過政綱、表現、往績來選出德才兼備的候選人，而不是單單一個名字，一些職銜，一些往績就可以自動爭取到選民支持。

隨著新選制的落地生根，選委會選舉的競爭性、先進性也在不斷彰顯，充分體現「愛國者治港」下的良性競爭。選舉雖然更加激烈，但始終秉持君子之爭、理念之爭、能力之爭，以政綱、表現、往績爭取選民支持。參選人對於政綱的重視，對於選舉工程的認真推動，其實也是對新選制的重視，對選民的負責。新選制之下，選委會的選舉制度已經突破某個界別、地區或團體利益的局限性，使得各階層、各界別、各方面在香港特區的管治架構中得到充分代表，充分體現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，這正是具香港特色優質民主的彰顯。

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
# 新皇崗口岸的實戰一課：問題可控，經驗可累



維港觀瀾

董光羽

新皇崗口岸在重陽節「長周末」的首日（10月17日）運作暢順，用家對其「硬件」設施與「軟件」安排普遍滿意；然而，翌日（18日）中午出境人流驟升，高峰時段輪候分流需時約30至45分鐘，一度出現人龍。對於新皇崗口岸這座全球最大陸路口岸綜合體而言，開通初期出現「小瓶頸」並非系統性失靈，而是多重短期因素疊加的結果；更關鍵的是，入境事務處與警務處的臨場應變迅速而有效，在巨量人流下仍能於3小時內將離境輪候時間回復至15分鐘以下。隨著技術磨合與用家熟悉度不斷提升，類似問題再次出現的機會極微，新皇崗口岸始終是用家的信心之選。

高峰人流量超出「常態」18日出現的「小瓶頸」，究其原因，是高峰人流的數量大大超出「常態」。據政府公布，18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，短短3小時內已有約19000名旅客經皇崗口岸離境，較舊皇崗／落馬洲管制站同期上升835%；而單是下午1時至2時的一小時內，更有9728人次離境，升幅達899%。

事實上，18日全日新皇崗口岸錄得逾15.2萬人次出入境，這樣驚人的客流量，是在一個設計日通關容量約20萬人次、配備134條合作查驗快捷通道與68條人工通道的口岸中發生的。換言之，「硬件」並非不敷應用，而是人流在極短時間「井噴式」湧入，任何口岸在類似情境下都需要時間消化；「重陽假期＋試新心態」產生的人流有多驚人，等候實屬無可避免。

「小瓶頸」成因與「軟件磨合」有關

至於「小瓶頸」的成因，筆者認為，更多與「軟件磨合」有關。新皇崗口岸是首個採用「合作查驗、一次放行」的港深陸路口岸，其設計初衷正是為了提升效率——自助通道最快只需20秒，整體通關時長由舊模式的30分鐘壓縮至5分鐘；然而，新模式的效率優勢需要用家充分配合才能釋放。據報，18日當天不少市民並未預先登記「合作查驗」，或不熟悉過機前需點按螢幕上的「同意」授權使用個人資料，亦有個別用家沒有脫下帽子，導致系統未能識別臉容，以致在開機前反覆嘗試，因而出現「瓶頸」。

更普遍的情況來自家庭出行：7歲以下兒童必須使用人工通道，但許多家長並不清楚這一限制，全家誤排自助開機，在開前無法通過，被迫折返、逆流重新排隊，加劇了通道口的擠塞。公道地說，特區政府在新皇崗口岸開通之前，已經反覆透過不同渠道講解各項安排，並於18日當天出現排隊人龍之時，亦已透過「口岸通」平台公布最新輪候時間資訊，建議市民及旅客及早規劃行程，並考慮使用其他口岸離境。筆者認為，用家使用任何新設施，包括新皇崗口岸前，其實亦有責任了解清楚各項要求；但不管如何，這些都屬於認知落差與使用習慣的問題，而非設施本身的承載力缺陷。

紀律部隊臨場應變值得肯定在這樣的前提下，紀律部隊的臨場應變理應得到客觀評價。18日當天入境事務處已開放L5層離境大堂全部過關通道及櫃位，並聯同警務處在L2及L5層實施分流與管制；正是這些應變措施奏效，才讓高峰時段的輪

候時間一直維持在可控範圍，並成功在3小時內逐步縮短；能有如此成績，當然要歸功於特區政府在新皇崗口岸正式開通前進行的逾100次測試和演練，就高峰人流制定分流、排隊管理及跨部門協調安排。今次面對突增人流，各項預案得以及時啟動，口岸整體運作大致暢順，相關部門交出令人滿意的成績表，絕對值得社會肯定。

## 累積經驗免問題再次發生

「小瓶頸」出現是事實，但長遠而言，筆者認為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的機會極微。例如：7歲以下兒童需走人工通道的規定經廣泛報道後，家長們自然不會重蹈覆轍；未預先登記「合作查驗」或不懂「同意」授權操作的用家，未來亦不會再遇到同類問題。再者，隨著運作不斷成熟，「合作查驗、一次放行」系統的各種技術問題亦將進一步減少，再加上特區政府各類宣傳與系統調整的同步推進，用家對皇崗口岸始終可以有十足的信心。

新皇崗口岸首個「長周末」的人潮，本質上是一項重大基建投入運作後無法完全避免的「陣痛」，暴露的不是系統失靈，而是一個更高效的全新通關模式投入使用時，用家和系統都需要時間去磨合和彼此適應。入境處與警務處在高峰時段的應變，證明現有體系能應對人潮和維持通關秩序，社會不必因為一次「小瓶頸」而過度憂慮，不如將它視為一次有價值的實戰——讓特區政府看清市民出行習慣、增加現場指示與掌握人流節奏，也讓用家親身體驗了新模式的要求。隨著登記普及和對新系統的熟悉度累積，未來即使再有出入境人流高峰，相信新皇崗口岸的通關安排依然會安全有序，值得信賴。

時事評論員



議論風生

胡劍江

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（APEC）財政部長會議於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舉行。這既是中央對香港的厚愛與支持，也是世界以實際行動對香港投下信任票。這場盛會必將成為香港強化內聯外通獨特優勢、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契機，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。

今年是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。2026年APEC「中國年」以「建設亞太共同體，促進共同繁榮」為主題，圍繞「開放、創新、合作」三大優先領域推進全年議程。香港承辦此次財長會，既是國家APEC「中國年」整體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為香港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、參與亞太財金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。

首先，此次APEC財長會議落戶香港，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、厚愛與堅定支持。

APEC是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合作機制，其財長會議匯聚區域內主要經濟體的財政、金融決策者，議題事關全球經濟治理格局與亞太產業鏈供應鏈的走向。這樣高規格的國際財金盛會選址香港，本身就傳遞出清晰信號：香港有能力、有條件、有信譽承辦此類多邊財金對話活動；香港也是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門戶。

其次，APEC財長會議花落香港，香港的內聯外通獨特優勢是關鍵。

「內聯」即「背靠祖國、聯通內地」。內地龐大的經濟體量、完整的產業體系和超大規模市場，是香港最深厚的底氣。近年來，「滬深港通」「債券通」「跨境理財通」等互聯互通機制不斷優化升級，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，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市場之間「超級聯繫人」和「超級增值人」的角色愈發凸顯。亞太各經濟體要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、捕捉中國內地市場的機遇，香港正是最便捷、最成熟的通道和窗口。

「外通」即「面向世界、聯通全球」。香港的普通法制度、自由港政策、低稅制、資金自由流動、與國際接軌的營商規則，歷經風雨洗禮而底色不改。APEC各經濟體財金

官員齊聚香港，親身感受這裏法治健全、市場開放、資訊自由流動的營商環境，正是對香港「外通」優勢最有力的確認。

第三，舉辦APEC財長會議，是向世界展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與發展成就的絕佳窗口。

金融中心不是靠自封的，而是靠市場說話、靠數據證明。香港資產管理規模逾5萬億美元，已是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；香港也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，處理全球約七成的離岸人民幣支付結算；香港新設集資額，同樣居全球之首。香港的金融版圖，正在傳統優勢與新興動能的交織中不斷拓寬。

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。面對外界過去對香港存在的一些偏見、誤解甚至不實論述，最有力的回應始終是事實和發展成果本身。讓各經濟體代表親身感受香港法治健全、自由開放、充滿活力的國際大都會面貌，以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市場活力和發展機遇，有助國際社會更加全面、客觀地認識香港。

第四，此次財長會議，還是香港落實首個五年發展規劃、建設「四中心一高地」的重要抓手。

舉辦APEC財長會議，是香港將國家規劃紅利轉化為自身競爭力的具體行動。一方面，借助會議平台，香港可深度參與亞太區域財金治理，在數字金融監管、綠色金融標準對接、供應鏈金融合作等前沿議題上發出香港聲音、貢獻香港智慧，提升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；另一方面，會議帶來的人流、信息流、資金流，將直接帶動會展、酒店、專業服務等相關行業，並為香港與各經濟體深化金融合作鋪路搭橋。

從更高層面看，當前世界經濟復甦乏力，單邊主義、貿易保護主義抬頭，亞太區域更需要加強財金政策協調、維護開放型區域經濟。香港承辦此次會議，搭建對話平台、凝聚合作共識，既是為區域經濟穩定貢獻力量，也是在國家對外開放大局中展現香港擔當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監事會副主席

# 法國大規模暴亂凸顯歐洲結構病灶



國際觀察

軒轅靖

法國街頭騷亂還在持續蔓延，規模已超2018年的「黃背心」運動。17日，法國全國約55萬人走上街頭示威，最終演變為騷亂，超過2000人被捕，600餘名警員受傷，大批政府建築物遭破壞，包括有143年歷史的利摩日市政廳被縱火焚毀。百貨公司、超級市場、名店，甚至是小型商店被暴徒洗劫，損失以數千萬歐元計。

## 宵禁無法真正解決問題

為防範騷亂重演，巴黎、里昂、尼斯等地周一晚上實施局部宵禁，馬賽更禁止一切公共集會或示威活動。

這絕非孤立的事件。從巴黎郊區高中對校舍破舊和教師短缺的抗議開始，短短數周內，示威便從教育經費延伸到生活成本、社會不平等與公共開支削減，並迅速

外溢至比利時、希臘、意大利和德國。法國每幾年就要「折騰」一次，不僅是法蘭西的尷尬，也暴露了歐洲的結構性病灶。

首先是財政難題。法國的公共債務在2025年已達到GDP的115.6%，2026年預計升至119.3%，超過歐盟60%上限的近兩倍。當一個國家每借來的四塊錢裏就有一塊用於支付舊債利息，任何削減赤字之嘗試都必然觸及民眾憤怒和社會動盪。學生抗議點燃了法國街頭暴亂的導火索，這是財政空間被債務利息和剛性支出擠壓殆盡後的必然結果。

糟糕的是，歐盟21國出現赤字，其中12個國家赤字佔GDP超過3%。隨著能源價格攀升，利息支出和軍費開支，歐盟2027年赤字率或達到3.6%。法國是歐盟支柱，法國街頭暴亂不僅揭開了歐盟畫皮，也會在歐盟引發連鎖反應。

其次是政治系統失靈。2024年6月馬克龍解散國民議會後，法國議會呈現左翼、中間派、極右翼「三足鼎立」的懸浮格局，沒有任何一個陣營擁有穩固多數。政治碎片化不僅導致法國左右極化，也說明法國移民融合政策的失敗，這一現象也是歐盟通病。2024年法國國民聯盟在立法選舉中得票率達到33.15%，德國選擇黨在2025年聯邦大選中得票翻倍至21%，歐洲議會中極右翼黨團席位從2019年的135席增至187席，佔比從18%升至26%。

極右翼的上升並非憑空而來，當一部分人口在居住空間、教育機會和勞動力市場上持續被隔離於主流社會之外，而主流政策在「融入」與「安全」之間反覆搖擺卻拿不出有效政策時，極右翼便獲得了穩定的選票。左右之間的政策空間被壓縮為對彼此的身份攻擊，法國和其他歐洲政府回應社會不滿的能力隨之進一步萎縮。

其三是歐洲的經濟環境越來越差。歐盟委員會將2026年歐元區GDP增速預測下調至0.9%，法國僅0.7%，德國停滯，奧地利處於衰退。與此同時，歐盟委員會預測法國和比利時2026年財政赤字均超過GDP的5%，各國在債務利息上升與增長乏力的夾擊下被迫同步削減公共開支。

## 經濟增長乏力助長動盪

有機構認為，歐洲經濟增長乏力「可能助長更多騷亂和民間動盪」。歐盟層面的財政規則要求成員國整頓預算，成員國層面的政治碎片化卻使任何整頓都寸步難行；各國政府無能為力，街頭便成了法國和歐洲各國民眾憤怒「表達」的場所。

法國騷亂蔓延至比利時、意大利、德國，不是某一國政府的失敗，而是這套「財政—政治—社會」傳導鏈在歐洲範圍內的集體失效。

法國人曾自嘲，改革只有在街頭才能被討論。但今次騷亂與2005年或2023年不同。2005年郊區騷亂的驅動因素是青年失業與聚居隔離，2023年納赫爾之死引發的暴力在四天內便波及市中心，而今次事件從教堂開始，穿過生活成本，直抵國家的核心。每一次「折騰」都說明法國結構性病徵的強化：債務更高，議會更碎，極右翼更強，公共服務的緩衝墊更薄。法蘭西經不起這樣反覆的消耗，歐洲也沒有多餘的制度餘量來承受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。

隨著宵禁實施，法國今次的街頭暴亂可能停止，但只要財政狀況沒有改善、政治極化繼續存在、移民和貧困問題沒有解決，法國街頭暴亂還會捲土重來，甚至蔓延至歐洲各國。這是法國病，也是歐洲病。

國際關係學者